

# 第一次世界大戰對 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

• 徐國琦

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著作宏多，史家已有定論。但該戰對中國歷史的影響，中外學界少有涉及，且歧見雜存，誤解甚深。本文作者近年來廣訪美、德、法、英、中(包括台灣)多種檔案，力求正本清源，撥誤歸真。現謹將一得之見，求教同人。得失與否，尚請方家指正<sup>①</sup>。

本文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在中國近現代史上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一戰的爆發不僅標誌着舊世界體系的崩潰，同時也為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提供了全新的平台。正當中國社會新舊交替，承前啟後，天命維新之時，一戰的爆發為學貫中西、深諳國際事務的新一代中國人如顧維鈞、王正廷、梁啟超、梁士詒等提供了在世界舞台折衝樽俎的大好機會。一戰期間，國人在思想、學術上兼收並蓄、求同存異，放眼世界，在政治上大膽探索，不拘一格，在外交上大膽進取、靈活多變，書寫了中國乃至世界外交史上壯麗的篇章。並正式宣告中國人徹底走出「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封閉狀態，以窮則變、變則通的心態在世界舞台上展開角逐，尋找一個新的國家認同及形象。

哈佛大學著名學者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不久前寫道，綜覽二十世紀，法國有兩大心結：一為法國之國際地位，一為如何處理與德國的關係<sup>②</sup>。本文認為，二十世紀的中國，用心則更為專一，即如何成為國際社會的平等一員。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走向世界及國際化的歷史。一戰的爆發，為中國人書寫這一嶄新歷史提供了良好契機。

## 一 國際史：一個新的解釋模式

敏感的讀者也許會問，如果一戰對中國如此重要，為何迄今為止，無人論及此點？誠然，即使一個人熟讀中外學者所有關於一戰的著作，恐怕仍舊無法

一戰的爆發不僅標誌着舊世界體系的崩潰，同時也為中國人尋求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提供了全新的平台，並為學貫中西、深諳國際事務的新一代中國人提供了在世界舞台折衝樽俎的大好機會。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可以說是正式宣告中國人徹底走出「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封閉狀態，以窮則變、變則通的心態，尋求新的國家認同、走向世界及國際化的歷史。

\*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張朋園，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香港中文大學金觀濤、劉青峰等曾對本文提出寶貴修改意見；尤捷小姐將本人潦草難認的手稿打成鉛字，特此致謝。

清楚理解中國在此戰中的地位。新近出版的兩本專著即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一本是傅高盛 (Niall Ferguson) 的《一戰之悲愴》(*The Pity of War*)，另外一本是柯庚 (John Keegan) 的《一戰新論》(*The First World War*)。兩書均出自名家之手，立論精闢，高瞻遠矚，發人深省。但在涉及中國問題上或略而不提，或無任何新見<sup>③</sup>。難怪哈佛大學中國近代史專家柯偉林 (William C. Kirby) 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儘管我們可以廣泛閱讀有關一戰的著作，我們仍可能無法得知中國參與其中的事實。」<sup>④</sup>甚至中國人自己的近著，寫及一戰與中國關係時，要麼是語焉不詳，要麼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並多冠以「賣國外交」等字樣。吳東之的《中國外交史》，李新及張玉法等有關中國近代史著作，雖多有創見，但對中國與一戰之關係，大多以消極評價作結<sup>⑤</sup>。

產生這種誤解的原因固然很多，但究其根源，似乎不外下述幾種因素：一是對當時的中國之偏見。認為積貧積弱、一盤散沙的中國很難在外交上有甚麼建樹。二是政治因素干擾。國共兩黨長期以來都是對北洋政府持否定批判態度，這種敵視直接影響到學術研究的公正。三是學術分野的作祟。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學術界似乎有一種不良現象，即隔行如隔山，治外交史者不管內政，治政治史者不涉及國際關係。這種傾向對北洋史研究尤為不利。因為中國在這一時期內憂外患集於一體，內政、外交密不可分。換言之，要正確理解一戰對中國的意義，學者必須打破樊籬，對內政、外交及社會與國際關係都要涉獵，否則即有「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誤。四是語言障礙。中外許多學者因為不能熟練運用外語從而無法閱讀他國檔案資料，這一局限造成學術視野的限制。

要正確全面理解一戰與中國的關係，我們必須跳出上述弊端，尋找一個新的研究方法。竊以為近年來哈佛大學著名歷史學家入江昭身體力行且運用達之化境的「國際史」(international history)，便是我們應該用來重理中國與一戰關係的新的解釋模式<sup>⑥</sup>。國際史是一種全方位的歷史研究法，它超越了傳統外交史一味強調政府之間的通訊、談判等限制，把文化、社會思潮變遷、個人情感等因素引入考察之列。國際史與傳統國別史、政治史的主要區別在於它超越國界，側重於多層次對話，並以整個國際體系作為參照系，強調國家間的政治、文化等多重交流、對話及互動。不言而喻的是，能夠熟練運用多種檔案語言也是國際史方法的首要條件。限於篇幅，本文不擬對國際史這一新興學科展開全面論述，但要指出的是，如果傳統方法令人不免有眼光短淺之譏，那麼國際史這一新的解釋模式則有「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之氣勢。本文認為，我們只有運用國際史這一新方法，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束縛，才能真正還一戰與中國關係這一重要歷史問題的本來面目。

即使我們廣泛閱讀有關一戰的著作，仍可能無法得知中國參與其中的事實。令人產生誤解的原因包括：一是對當時的中國之偏見，認為積貧積弱的中國很難在外交上有甚麼建樹。二是政治因素干擾。國共兩黨長期以來都是對北洋政府持否定批判態度。三是學術分野的作祟，治外交史者不管內政，治政治史者不涉及國際關係。四是語言障礙，中外許多學者因為不能熟練運用外語從而無法閱讀他國檔案資料。

## 二 中國對一戰的反應及對策

研究中國對一戰的反應，我們必須考察當時中國及世界所處的環境。顯而易見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人大規模思考中國國家認同及其國際

從甲午戰爭到一戰這二十年間，中國的最大轉變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及其與國際主義的兼收並蓄，以及「外交政策群體」的形成。這一群體大致包括言論精英如梁啟超、外交才俊如顧維鈞、梁士詒和陳獨秀等一大批知識份子，以及部分工商業人士。他們敢於直面不利的國際國內環境，敢於並善於對舊文化、舊秩序、舊的國家認同宣戰，力圖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命運。

地位問題的轉折點。甲午一戰，中國敗於日本之手，終於從「四千年之大夢」中驚醒<sup>⑦</sup>。從甲午戰爭到一戰在歐洲爆發這二十年間，中國在社會、政治、思想、文化、世界觀等多方面均經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大批先進的中國人意識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已徹底失效，認識到坐井觀天只能將中國進一步推入深淵。他們主張「保中國不保大清」<sup>⑧</sup>，主張西體西用，主張放棄落伍的「朝貢」意識，建立現代外交體系；主張放棄儒家文化，徹底向西方學習；主張打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態，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及「德、賽」（民主、科學）二先生。在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經歷了從君主到共和的轉變，從農曆到西曆的轉變，從黃袍馬褂到西裝革履的轉變，從「不談國事」到人人競談時務的轉變。不過這一時期的最大轉變，可能還是民族主義的興起及民族主義同國際主義的兼收並蓄和「外交政策群體」（foreign policy public）的形成。

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漲固然是甲午戰後的中國社會變革的一大特色，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此民族主義決非排他性的、狹隘的，而是建立在中國人希望加入國際社會作為平等一員的強烈願望之上的<sup>⑨</sup>。用美國歷史學家柯瑞佳（Rebecca E. Karl）的最新研究成果來表述，就是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的興起，實乃中國密切參與國際社會的產物（“marked a Chinese intervention in the world”），是中國「重新定位自己及世界」的結晶<sup>⑩</sup>。換言之，中國的民族主義是國際化的民族主義（internationalist nationalism），是建立在「世界主義」之上的「國家主義」。用近代政論家學者及政治家楊度的詞彙就是「世界的國家主義」<sup>⑪</sup>。

所謂「外交政策群體」，是指當時一大批先進中國人中的特殊群體。他們因對國事的關心，從而對國際事務及中國的外交政策及其國際地位產生超乎尋常的密切關注。雖然他們的絕對人數並不是太多，但能量很大，頗有一個鬆散的團體之勢，這裏姑稱之為「外交政策群體」。這一群體大致包括言論精英如梁啟超、外交才俊如顧維鈞等，以及部分工商業人士和一大批能夠閱讀的知識份子思考群。一戰期間，中國的這一「外交政策群體」已臻成熟。他們利用參與決策及控制輿論的優勢，利用國人對時務普遍關注的社會現象，指點江山，以文字、決策、「罷工」、「抵制洋貨」等多種形式影響外交政策。這一「外交政策群體」構成一戰期間影響中國外交及中國國際化的重要有生力量。由於這一系列轉變及「外交政策群體」的出現，「1914一代」的中國人與歷史學家沃爾（Robert Wohl）描繪的歐洲「1914一代」相比，更為老謀深算<sup>⑫</sup>。他們生於憂患，比起著名詩人艾略特（T. S. Eliot）筆下的歐洲那種「兩個世界的彷徨者」（wanderers between two worlds）來，陳獨秀、梁啟超、梁士詒等領導的新中國人更負使命感、危機感，他們敢於直面不利的國際國內環境，敢於並善於對舊文化、舊秩序、舊的國家認同宣戰，力圖改變中國多災多難、積貧積弱的命運。他們的理念支柱是幫助中國的國際化及中國成為國際的平等一員。

要將新的國家認同及國際化在中國付諸實施，需要有兩大國際和國內條件。一是國人全面覺醒，並摒棄固步自封的封建機制，二是舊世界秩序的崩潰。辛亥革命順時應勢一舉推翻在中國延綿二千餘年的君主體制，並促成中國追隨法、美之後，一躍成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在中華民國初期，儒家文明被西方思潮代替，西方的各種政治思想、流派相繼進入中國人的視野。有人甚至

響亮喊出「打倒孔家店」和只有「德、賽」二先生才能救中國的口號。國人的新世  
界觀及新觀念為中國之國際化創造了條件。

如果說辛亥革命的發生及隨之而來的一大批優秀中國人世界觀的進步，為  
中國進入國際化社會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內部環境，那麼1914年6月發生在巴爾幹  
半島的槍聲則標誌着一場「大戰爭」的來臨及舊的國際秩序崩潰的開始<sup>⑩</sup>，並為中  
國的國際化提供了國際平台。換言之，歐戰的爆發為中國的國際化付諸實施提  
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動力及前提，一戰也由此介入中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一  
個里程碑及重要轉折點。

在我們進一步研究一戰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對一戰的反應之前，我們必須  
首先界定甚麼是中國的國際化 (internationalization)。本文所謂的中國「國際化」，  
實指中國作為一個政治實體，不但有積極參與國際社會及國際體系的動力及意  
願，而且主動採取各種手段、方式及政策，進一步推動中國成為國際社會平等  
一員及與國際社會的廣泛多層次接觸和交流。中國的國際化是中國人對自己的  
國家認同及對其國際地位深切關注而產生的理念。一戰的爆發為中國的國際化  
注入了一針強烈的催化劑。

一戰時期的中國固然存在許多問題，如政治上分崩離析，一盤散沙；經濟  
上積貧積弱，民不聊生；國際上地位低微，處處受人制約，但不可否認的是，  
同一時期的中國恰有春秋戰國時期的明顯特徵，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一大批志士仁人以天下為己任，競相走向歷史舞台，為中國的國際化獻計獻  
策，身體力行。換句話說，一戰時期的中國頗有些像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在  
其名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 中所寫<sup>⑪</sup>：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昧的時代。  
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季節，也是黑暗的季節。  
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似乎擁有一切，我們好像又一無  
所有。我們會直接進入天堂，我們也可能進入地獄。

在這一時期，以留學生為主體的中國社會精英，富於進取，熟諳中外事務，逐  
漸成為主持中國外交的中流砥柱。民族主義自強圖存成為這一時期的重要口  
號，並驅使一大批先進中國人追尋新的國家認同及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平等地  
位，從而第一次把中國的聲音及理念系統納入國際秩序藍圖之中。

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指出，正是中國當時的積貧積弱，無實力可憑，才使  
梁士詒、顧維鈞等利用一戰的爆發，書寫了一曲絕妙的外交篇章。長期以來，  
治北洋史者大都認為弱國無外交，殊不知，只有弱國，才懂得外交的重要，外  
交與它們的生存息息相關。對弱國而言，外交是它們在國際環境中賴以求生的  
唯一法寶。相反倒是對大國、強國來說，外交的重要性則略遜一籌，因為它  
們有實力作後盾。大革命後的法國在著名外交家塔列朗 (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 的精心策劃下，雖戰敗卻能出席維也納會議，未蒙受重大損失，甚而  
繼續躋身強國之列，此乃弱國外交的經典案例。在北洋時期的中國，胸懷韜略  
的一代外交家、政治家及許多「外交政策群體」成員在思考中國如何應對歐戰爆

歐戰的爆發為中國的  
國際化付諸實施提供  
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動  
力及前提。一戰時期  
的中國，以留學生為  
主體的中國社會精英  
逐漸成為主持中國外  
交的中流砥柱。民族  
主義自強圖存成為這  
一時期的重要口號，  
並驅使一大批先進中  
國人追尋新的國家認  
同及中國在國際社會  
的平等地位，從而第  
一次把中國的聲音及  
理念系統納入國際秩  
序藍圖之中。

發後新的國際形勢時所唯一依賴的是他們的膽識、學養及對國際事務的理解，以及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及民心。一戰的爆發為他們展示才華、推動中國國際化提供了歷史契機。

質言之，列強於1914年在歐洲開始火併的結果，從積極意義上說促使列強長期以來在中國營建的均勢機制 (balance of power) 逐漸瓦解，為中國尋求國際化、謀求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更重要的是，舊的世界秩序雖已崩潰，新的國際體系尚未建立，此一形勢正可為中國進而參與創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一個歷史機遇。從消極的意義上講，由於交戰列強在中國各有勢力範圍存在，一戰的爆發，遲早會把中國捲入戰爭的漩渦。更有甚者，歐戰的爆發為新近興起的日本進一步侵略中國提供了千載難逢之機，日本正可利用列強在歐洲互相廝殺、無暇他顧之際，欲將中國淪為其後院。1914年8月日本千方百計擠入戰團，並在很快奪取德國控制下的中國山東後，於1915年初旋即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之舉即為明證。但歐戰的爆發，對中國的「外交政策群體」而言，無疑也是天賜良機。如梁啟超稱歐戰的打響對中國來說是千載難逢之機遇，中國應善加把握<sup>⑮</sup>。後來成為《中國外交史》一書作者的劉彥在歐戰爆發後向外交部幾次上書，力陳中國立即對德宣戰的必要<sup>⑯</sup>。歐戰伊始即在德國觀察研究戰爭的張君勱在1916年回國後預言德國必敗。他認為，如果中國想要在戰後尋求國際化及平等地位、修正列強在中國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中國應爭取利用歐戰的機會「立功」，由此方可實現中國平等加入國際社會的長遠目標<sup>⑰</sup>。事實上，梁啟超、張君勱、劉彥等人的主張在當時的主要媒體如《東方雜誌》、《甲寅雜誌》、《大中華》、《新青年》等均有反映，絕非少數人之意見，如劉叔雅在《新青年》上登文呼籲中國青年應認識到在當今國際事務中強權即正義，一個國家只有憑勇氣、實力，才能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他激勵國人不怕犧牲，放手參戰<sup>⑱</sup>。

歐戰爆發，促使列強長期以來在中國營建的均勢機制逐漸瓦解，為中國謀求平等待遇提供了有利條件，並為中國參與創建世界新秩序提供了機遇。但日本也趁列強在歐洲互相廝殺、無暇他顧之際，欲將中國淪為其後院。1914年8月日本對德宣戰後，馬上攻佔青島。圖為日軍奪取青島後，英軍登陸，在日兵身旁經過的情景。



除上述輿論精英外，決策層鼓吹中國立即參戰的也大有人在，如張國淦、梁士詒等在一戰之初即力主中國參戰，其中梁士詒的主張尤具說服力。梁士詒在民國早期即大權在握，素有「二總統」之稱，外人對其也評論甚高，稱其為「中國的馬基雅維里」。梁氏雖在袁世凱帝制及財政等問題上授人以柄，但在中國參戰問題上一直立場堅定，高瞻遠矚。他認為參戰一可從德人手裏奪回青島，二可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三可在戰後和會上佔有一席之地，直接參與國際事務<sup>⑩</sup>。為了參戰，梁士詒以其商人的精明、政治家的敏感及外交家的深思熟慮，在1915年別出心裁地提出了「以工代兵」計劃，意圖在中國正式參戰之前能夠同協約國建立更加密切的外交聯繫。梁氏的「以工代兵」計劃雖有盈個人私利之嫌，但此一構思及其成功付諸行動，實乃先進中國人尋求加入國際社會及國際化的一個創舉，其意義遠非十四萬華工赴法同英法美聯軍並肩奮鬥所能概括。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有膽識、有目的、有遠見地加入國際社會的開始，是東方大國參與拯救西方文明的親密合作的大事。更為重要的是，十四萬華工無疑是十四萬使者，他們充當了架接東西文明的橋樑，並在回國後在中國建設、尋求新的國家認同中充當了重要角色<sup>⑪</sup>。

誠然，對日本的防範，是「外交政策群體」主張加入歐戰的另一主要原因。袁世凱的中國政府對歐戰迅速作出反應，實首先出於防止日本奪取中國青島的考慮。有顧維鈞、梁士詒等輔佐的一代梟雄袁世凱，在歐戰伊始親自向英國駐華公使兼協約國駐京外交團首領的朱爾典(John Jordan)試探，提議中國與英國共同對青島出兵，攻打德國。換言之，一戰甫一爆發，中國為了收復失地，避免日本在華野心得逞，即有參戰之心。但朱爾典未接受袁氏之議，導致中國1914年參戰之舉胎死腹中。前英國《泰晤士報》(The Times)記者後為袁世凱顧問的莫理循(George E. Morrison)稱朱爾典未加仔細考慮，即貿然拒絕中國在1914年直接捲入戰團的做法為「一大蠢舉」<sup>⑫</sup>。但中國人的參戰心願並未因此放棄，反而因日本1915年初向中國提出的「二十一條」而更加堅定。

日本「二十一條」的提出，進一步增強中國尋求利用國際論壇來解決日本侵略及列強在中國不平等地位的迫切性。力爭參加戰後和會是自歐戰以來中國「外交政策群體」一直思考的問題。早在1914年11月10日，外交部參事伍朝樞即向外交部提出備忘錄，認為中國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關於山東問題在內的許多外交糾紛，力爭將包括日本問題在內的一切事端提交戰後和會討論、裁決<sup>⑬</sup>。中國駐美公使夏偕復也強烈主張中國加入戰後和會的必要，呼籲當局早作籌備<sup>⑭</sup>。後來成為外交部代理外長的夏詒霆也在1915年1月15日就有關中國參加戰後和會問題，向外交部呈交一份長備忘錄，同樣主張中國為了提高其國際地位並成為國際事務中平等一員，為了有利解決外交爭端，應設法加入戰後和平會議，並加緊遴選與會代表，未雨綢繆<sup>⑮</sup>。

凡此種種議論，雖尚顯稚嫩，而且缺乏實際操作程序，但箇中良苦用心及高瞻遠矚，實乃顯明。對此中國外交部明顯贊同並付諸實施。早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當天，外交部即向中國駐外使團發出指令，要求他們群策群力，幫助政府尋找參加戰後和會的機會，以利山東諸問題在戰後得到有利解決<sup>⑯</sup>。外交部同時派特使協調各駐外使團促成中國參加和會的努力，並徵求國外國際法專家的

一戰甫一爆發，中國為了收復失地，避免日本在華野心得逞，即有參戰之心。但協約國駐京外交團首領朱爾典未接受袁世凱提出的與英國共同出兵青島之議。1915年11月，即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後，袁世凱參戰之意已定，遂請總統府顧問莫理循立即找一個中國可以參戰的理由。為了增加參戰籌碼，中國甚至秘密向英國提供軍火。

意見。1915年1月22日，外交部成立高規格的參加和會問題研究小組，組員包括外長陸徵祥、副外長曹汝霖、參事顧維鈞等人。當然中國參加和會的最終保證是參戰。外長陸徵祥與日本簽署「二十一條」的相關協定後，即向袁世凱總統明確建議：解決山東問題的關鍵在於參戰。甚至在五四運動期間被斥為賣國賊的曹汝霖也在1915年10月向袁世凱表示，阻止日本人進一步對華侵略的企圖在於中國直接參加歐戰<sup>26</sup>。

基於上述考慮，儘管中國在1914年參戰動議遭到朱爾典的拒絕，但其加入戰團之心，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之後更加強烈，乃至1915年中國人再次嘗試參加協約國對德作戰。1915年11月1日，袁世凱的心腹秘書蔡廷幹通知總統府顧問莫理循：袁世凱參戰之意已定，請莫立即找到一個中國可以參戰的理由<sup>27</sup>。

1915年11月6日，中國正式通知英國，表示中國準備向德國宣戰，但為防日本從中作梗，要求英、法、俄出面邀請。為了增加參戰籌碼，除了派遣華工外，中國甚至秘密向英國提供軍火，至少有三萬枝步槍通過梁士詒經香港秘密移交英國<sup>28</sup>。此時的英、法、俄，由於戰爭局勢嚴峻，亟需外援，因此對中國的參戰提議表示歡迎，並表示願意出面安排。正如中國政府所預料的，日本極力反對中國參戰。為阻止中國參戰的圖謀，日本甚至向協約國暗示，日本可能琵琶別抱，轉與德國為友。對英、法、俄來說，日本的地位遠較中國重要。結果是，中國政府第二次參戰的努力到1916年初因日本的反對再次付諸東流。更讓中國始料未及的是，日本不但粉碎了中國1915年參戰的夢想，並且進而迫使協約國諸國秘密保證支持日本戰後對中國山東的要求。此秘密交易在1917年初以秘密條約形式固定下來。正是由於日本同英法俄意等達成犧牲中國的秘密交易，在1917年春天中國準備藉美國參戰之機，第三次嘗試進入戰團時，日本一改初衷，對中國的參戰未予反對。1917年8月，中國歷經三年的奮鬥，終於正式向德、奧宣戰。

1917年8月，中國歷經三年的奮鬥，終於正式向德奧兩國宣戰，並立即宣布廢除同德奧所定一切不平等條約，收復德奧在中國的租界，終止支付德奧庚款，取消德奧在中國的治外法權。由此首開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系統收復國家主權的先河。中國參加一戰，從小處着眼，是為了應付日本；從長遠看，是為了走向國際化，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發言權。

### 三 一戰對中國的影響及中國對一戰的貢獻

中國對德、奧宣戰，不僅展示了中國利用外交進入國際社會成為平等一員及國際化的良苦用心，並首開中國從鴉片戰爭以來系統收復國家主權的先河。中國甫一宣戰，不僅立即宣布中國同德、奧兩國所定的一切不平等條約隨之廢除，並收復德、奧在中國的租界，終止支付德、奧庚款。更重要的是，德、奧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也被中國一概取消。中國人堅持不懈的利用歐戰之機力爭正式加入戰團的舉動，充分反映了中國人尋求國際化的決心，並以參戰外交一改傳統中國人落後的世界觀，承認西方主宰世界體系，並力求加入國際社會成為受人尊重的平等一員。中國初涉近代外交，即身手不凡，以遠大的目光、靈活的外交，讓世人吃驚，其在巴黎和會的表現，更是可圈可點。中國能夠躋身戰後巴黎和會本身，即是中國一戰外交一個成功的例證，實現了其在戰爭伊始即要參與和會的目標。在和會上，中國代表敢於並善於參與國際新秩序的建設，力圖讓戰後新世界秩序有中國的烙印、聲音。這本身就是一大外交勝利。

中國參加一戰，從小處着眼，是為了應付日本，為了在戰後和會上佔一席之地。從長遠看，是為了加入國際社會，為了走向國際化，為了中國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有發言權。在和會上中國代表團據理力爭，並大義凜然地拒簽對中國不利的《凡爾賽和約》，他們的行動不僅把所謂「中國問題」帶到了世界最高論壇，且贏得了道義的勝利，也為山東問題在巴黎和會結束後的迅速解決提供了契機。因此，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並未完全失敗。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大獲成功。沒有中國參戰及拒絕簽訂巴黎和會對德和約，中國不可能在1921年很快同德國簽訂平等條約，並在1922年迫使日本歸還山東。中德1921年條約是近代中國與歐洲大國簽訂的第一個界定雙邊關係的平等條約。

更為重要的是，在巴黎和會上，中國人積極參與戰後新秩序的建立。例如顧維鈞是起草國際聯盟憲章的十五人委員會成員之一，對憲章的撰稿，貢獻頗多。中國人甚至從大局着眼，支持日本代表團提出的「種族平等」條款。凡此種種，不僅讓國際社會聽見了中國的聲音，更為未來中國成熟外交創造了範例。

在巴黎和會上，英國外相巴爾福 (Arthur Balfour) 聲稱一戰期間中國為戰爭「未花一先令，未死一個人」<sup>⑨</sup>。這是明顯違背史實之論。正如前述，一戰期間中國為英、法提供了十四萬精壯青年華工，這十四萬青年實際上間接為英、法提供了十四萬大兵。正因為這些人馳赴歐洲大陸，英、法才得以從自己的公民中騰出十四萬人走上戰場。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華工中有約五千人或在赴歐途中死於德國潛艇攻擊，或捐軀歐洲，血染沙場。更應指出的是，巴爾福等人應該清楚，中國早在1914年即有出兵參加歐戰之意。梁士詒的「以工代兵」的最初版本實是「帶槍華工」。當1917年中國終於擠入戰團時，出兵似乎更是情理之中的。正如顧維鈞當時指出，對中國來說，參戰並出兵是中國的一大「妙着」。出兵歐洲一舉，不僅能提高中國言而有信、實際參與的信譽，並因此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而且能在實戰中提高中國士兵的素質和鬥志，為中國的富國強兵打下基礎<sup>⑩</sup>。對主張出兵的段祺瑞來說，中國甚至可以趁機以出兵來練兵、增兵，以此增加自己的資本及實力。正是基於此一考慮，段祺瑞內閣甫一宣戰，即表示中國願意向歐洲出兵，但需要美國及協約國等為中國出兵提供運輸及資金。但參戰大國中，只有法國真誠希望中國出兵歐洲，並為此積極奔走，張羅運輸及資金。英國暗拖後腿。日本則竭力反對。美國人不感興趣。最終導致中國人出兵到歐洲同列強並肩作戰的宏偉計劃擱淺。出席巴黎和會的列強代表對這些事實視而不見，反怪中國參戰不力，實乃有欠公正。現在該是還中國與一戰關係之真實面目的時候了。

在巴黎和會上，英國外相巴爾福聲稱中國為一戰「未花一先令，未死一個人」，明顯違背史實。一戰期間中國為英、法提供了十四萬精壯華工，間接為英、法提供了十四萬大兵；這批華工中有約五千人或死於赴歐途中，或捐軀歐洲。1917年中國對德宣戰後，更打算出兵歐洲。對主張出兵的段祺瑞來說，中國可以趁機練兵、增兵，以此增加自己的資本及實力。

#### 四 簡短的結論：一戰研究在中國的意義

一戰期間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奇怪的綜合體：政治上民族主義高漲，文化上高度反傳統，外交上則強調國際化及國際主義。這一時期的中國既有學貫中西、以天下為己任的一大批精英，也有目光短淺、不知國家為何物的軍閥。凡

此種種，莫衷一是。但就是在這種新舊混雜，天下大亂的局勢下，中國人開始系統書寫其以一戰為契機的走向國際化的壯麗篇章。

中國的一戰外交及國際化努力是中國史乃至世界史上的重大事件。從某種意義上說，只有中國的參戰才使歐戰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中國對一戰的政策，也進而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後來的內政及社會。換句話說，歐戰把中國變成世界史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把歐戰世界化了<sup>⑩</sup>。

不論我們如何評論一戰對中國的意義，或中國對一戰的貢獻，我們必須在一戰研究中恢復中國與此役關係的真實記憶。苟如此，我們才能進而理解一戰的世界影響，並通過研究中國與一戰的關係，填補世界戰爭史、外交史、社會史研究上的一項空白。長期以來，中外學術界似乎一致公認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在中國歷史及世界史上的重大影響力，對此本文沒有異議。但本文要強調的是，我們只有在充分理解中國與一戰關係之後，才能真正明白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的真諦及內涵，才能把五四運動和巴黎和會的研究推到新的高度。尤為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同意一部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實乃中國尋求國際化的歷史這一基本判斷的話，本文旨在論證的是，中國對一戰的反應及政策是其走向國際化的開端。換言之，對中國而言，二十世紀是從一戰開始的。

### 註釋

① 有關一戰與中國關係的詳細研究，參見Xu Guoqi, *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② Stanley Hoffmann, "France: Two Obsessions for One Century", in *A Century's Journey: How the Great Powers Shape the World*, ed. Robert A. Pasto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63-89.

③ Niall Ferguson, *The Pity of War* (London: The Penguin Group, 1999);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99).

④ William C. Kirb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Foreign 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Republican Er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50 (June 1997): 442.

⑤ 例如，李新等編：《中華民國史》（北京：中華書局，1987）；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⑥ 詳情請參閱Akira Iriye,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ed. Michael J. Hogan and Thomas G. Pater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214-25;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94, no. 1 (February 1989): 1-10.

⑦ 「四千年之大夢」是梁啟超用語，轉引自梁啟超：〈戊戌政變記·附錄一：改革起原〉，載《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36），頁113。

⑧ 轉引自梁啟超：〈戊戌政變記〉，載《飲冰室合集·專集》，第一冊，第一卷，頁76。

⑨ 關於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關係問題，請參閱，Xu Guoqi, "Internationalism as Nationalism: China during 1895 and 1919", in *Chinese Nationalism in Perspective: Historical and Recent Cases*, ed. C. X. George Wei and Xiaoyuan Liu (Westport, CT: 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1), 101-120。

⑩ Rebecca E. Karl, *Staging the World: Chinese Nationalism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6, 201.

- ① 楊度：〈金鐵主義說〉，此文最早發表在他本人主編的《中國新報》第1至6期（1906-1907）。
- ② Robert Wohl, *The Generation of 1914*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③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早期正式稱呼是「大戰爭」(the great war)。
- ④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
- ⑤ 關於梁啟超的觀點，請參閱梁啟超：〈歐戰蠡測〉，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二冊，第三十三卷，頁12；〈外交方針質言(參戰問題)〉，載《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二冊，第三十五卷，頁4-13。
- ⑥ 劉彥著，李方晨增訂：《中國外交史》(台北：三民書局，1962)，頁409。
- ⑦ 詳見張君勱：《中西印哲學文集》，上冊(台北：學生書局，1981)，頁65-66、165。
- ⑧ 劉叔雅：〈歐洲戰爭與青年之覺悟〉，《新青年》，第二卷第二號(1916)。
- ⑨ 有關張國淦的參戰立場，詳見張國淦：〈對德奧參戰〉，載杜春和編：《張國淦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頁153-97。關於梁士詒其人，請參閱鳳岡及門弟子編：《民國梁燕孫先生士詒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78)；關於梁士詒的一戰觀點，參見《年譜》，上冊，頁194-96；關於西方人對梁士詒的評價，參見Michael Summerskill, *China on the Western Front: Britain's Chinese Work Force in the First World War* (London: The Author, 1982), 30。
- ⑩ 有關一戰華工的詳細觀點，參見徐國琦：〈一戰期間中國的「以工代兵」參戰研究〉，《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0年12月號，頁53-62。
- ⑪ Hui-min Lo,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vol. 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559.
- ⑫ 伍朝樞致外交部備忘錄(1914年11月10日)，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日關係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4)，頁436-37。
- ⑬ 夏偕復致外交部(1914年12月25日)，載《中日關係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頁598-600。
- ⑭ 夏詒靈致外交部(1914年12月25日)，載《中日關係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頁664-69。
- ⑮ 外交部致駐各國公使館(1915年1月18日)，載《中日關係史料：歐戰與山東問題》，下冊，頁678-79。
- ⑯ 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香港：春秋雜誌社，1966)，頁138。
- ⑰ 蔡廷幹致莫理循，Lo, *The Correspondence of G. E. Morrison, vol. 2*, 463。
- ⑱ 法國外交部檔案館外交檔NS, Chine, 132:89-95；《民國梁燕孫先生士詒年譜》，上冊，頁300-301。
- ⑲ Balfour to Curzon, May 8, 1919, in *Documents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 1919-1939*, ed. E. L. Woodward and others (London: H. M. Stationary Office, 1946-1985), Series 1, Vi: 565-66.
- ⑳ 顧維鈞致外交部電(絕密)(1917年9月11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北洋外交部檔03-36/18-(1)。
- ㉑ 關於中國與一戰關係在世界史的地位問題，請參看本人最近的一篇文章：Xu Guoqi, "China's Great War: An Unwritten Chapter of World History", *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 12, no.1 (Spring 2005): 127-39.

徐國琦 美國Kalamazoo College歷史系陳文昭講座副教授，近著有*China and the Great War: China's Pursuit of a New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目前從事體育與中國國際化課題之研究。